

罗蒂新实用主义及其对现代主义社会学的影响

宋跃飞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通过对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对现代主义社会学提出的挑战进行总结,指出罗蒂的思想实际上调和了现代主义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端。

关键词: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学;挑战;调和

中图分类号: C 91 -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390X (2010) 01 - 0018 - 04

Rorty's Neo-pragmatism and Its Influences to Modernism Sociology

SONG Yue-f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n Rorty's main thoughts, this article aims to summarize his neo-pragmatism and its challenges to the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This article believes Rorty reconciles the dispute between modernistic sociology and post-modernism by using the pragmatism.

Key words: Neo-pragmatism; Post-modernism; sociology; challenge; reconciliation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皮尔斯、詹姆斯、杜威等人开创的实用主义摆脱了此前的衰落和萧条,开始在美国复兴。这种复兴是通过很多哲学家借用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和方法,回归传统实用主义核心命题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被称作“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的确立对于美国本土及欧亚大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和宗教等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罗蒂是这股新实用主义思潮的代表者和拥护者。他彻底否定实在论,坚持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表象主义,结合古典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部分预设,创立了所谓的“后哲学文化”或“无镜的哲学”。

本文在总结罗蒂主要思想的基础上,对其给予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重大影响和挑战进行反思。

一、反基础论

关于基础论,各种观点纷繁杂陈。大体上有基础论和反基础论两种,而在每一类别内哲学家

们又有不同的见解。罗蒂是坚决站在反基础论立场上的。罗蒂认为,哲学家长期以来关注两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乎人类存在物和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区别,并被综括为那些考虑心与身关系的问题”^[1]。对此问题,哲学家之间争论不休,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追逐统一的思想方案。罗蒂称持有这样观点的哲学家为“系统的”哲学家。这些“系统的”哲学家坚持17世纪以来的“心”或“镜像”或“自然之镜”的观念,认为存在着认识或知识的来源基础,无论这种基础是客观实在,还是主观实在。

罗蒂指出,早在康德的思想里就蕴含了基础与认识统一的思想萌芽,但是因康德是以先验范畴作为中介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所以存在着哲学上先验论的谬误。罗蒂认为,只有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的思想才使得“‘知识基础’的观念和以笛卡尔回答认识论的怀疑论者的企图为中心的哲学观念,都被抛弃了”^[1]。

罗蒂在1979年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明确表示了反基础论和反二元论立场。他说，“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1]。那么，罗蒂与实在论的观点是如何进行争辩的呢？

他说，每个人都直观地将世界分为心的部分和物的部分，也就是基础的部分和建基于基础之上的部分，而心与物的区分造成了本体论的裂隙，“不可能用经验手段弥合”^[1]。某些罗蒂称他们为“新二元论者”的语言学家试图用语言对此裂隙进行修补，认为心与物只不过是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不同语言陈述而已。但罗蒂认为，他们仍然面临着“什么东西的两种描述”^[1]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会使得任何语言学的修补无济于事。

罗蒂的看法是，唯一能够证明自然本体论的就是有关个体与普遍、无限与有限和人与神的区分。他说，无限性和神性如果存在，那只能求助于非物质性，但心性与非物质性不同，而心性与物性相对，非物质性与物质性相对，但物性与物质性是同一个意思。既然我们知道，心性与非物质性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概念如何能有同义的对立面”^[1]这种状况呢？这就陷入了逻辑矛盾之中，所以新二元论者的论证和观点都是错误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与论证，罗蒂认为，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如先验的、经验的、语言的等等，实在论都存在着诸多难以破解的矛盾和难题。这种实在的基础论观点是成问题并难以接受的。既然基础论的观点存在问题，那么依靠这种论调建立的二元论自然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进而，古希腊哲学家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哲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它不再是决定其他学科知识生产、指导人们生活的合法权威。

二、反真理论

罗蒂还说，哲学家关注的另外一些问题可以表述为“关乎认知要求的合法性，并被综括为有关知识‘基础’的问题”^[1]。这一问题也是令许多哲学家难以释怀的认识论和真理论问题。正是

在基础论和二元论观点的基础上，很多哲学家们一直坚持认为，心仿佛一面镜子，可以对客观或主观实在进行再现或映射，从而产生人的认识和知识，而真理恰恰是那些最精确地再现实在或者基础的认识。这种观点被罗蒂称作镜像哲学。而镜像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坚持认为认识是符合实在的，是实在基础的再现或表象，洛克的白板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洛克认为，人像一张白板，是通过实在的再现或表象来获得认识的。这种反映论、再现论或表象论遭到罗蒂尖锐的批判。

罗蒂认为，心与物的二元分立导致了一种与此相应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试图对心理过程提出一种准机械性的论述，以便以某种方式认可某些知识主张和拒绝另一些知识主张”^[1]，主张“存在着有关准确再现的可能性或程度的问题”^[1]。而在罗蒂看来，这是大错特错的。

罗蒂说，笛卡尔、洛克以降的认识论都主张，客体是主体认识的基础，一切认识都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反映或再现，这种有关知识基础的观点来自于希腊人在知觉与认知间进行类比的结果，这种类比认为“认识一个命题为真，就相当于被一对象促动去做某件事”，“有一种力量，而不是我们自己，在迫使我们相信”^[1]。罗蒂认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论断，因为不存在什么基础性的東西，而这种机械性的反映或再现更是不能让人接受。心与物二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建基于此的自然是毫无根据和荒谬绝伦的。

罗蒂进一步指出，为避免这种简单的表现论、认识论遭受致命的摧毁，仍然坚持这种认知论传统的哲学家就变换手法，声称“感性直观首先被确认为偶然真理知识的来源，而概念则被看作是必然真理知识的来源”^[1]，通过宣扬理智高于感官的说法让人们相信，概念才是必然真理知识的源泉。罗蒂说，这种感性与理智、偶然真理与必然真理的区分也是近代二元论哲学的直接后果，这种区分本身就毫无道理，依然是建立在基础论上的陈词滥调。

这种区分只不过是由于人们不同的行动目的或目标而进行的，只不过是为了人们行事的方便建构的。

可见，罗蒂认为与基础论相联系的认识论只不过是心与物分立思想的延伸，都应遭到批判。

在这里，罗蒂运用杜威和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的行为主义”，即参照社会使我们能说的东西来说明合理性与认识的权威性这一实用主义论断，提出了与后现代主义相融洽的反绝对真理的观点。

与此相对应，罗蒂提出了自己的“教化哲学”观点。他说，教化哲学的目的在于“防止谈话蜕化为研究、蜕化为一种观点交换的企图。教化哲学家永远也不可能使哲学终结，但他们能有助于防止哲学走上牢靠的科学大道”^[1]，教化是为了“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1]。罗蒂认为，真理只不过是“正常谈话的正常结果”^[1]，而教化哲学所要做的就是“履行杜威所谓的‘击破惯习外壳’这一社会功能”^[1]。

三、实用主义哲学观

如果说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罗蒂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西方哲学发展脉络的话，那么在《后形而上学希望》一书中所提倡的“建设性的”教化哲学建构观点，对自己主张的新实用主义进行了正面的命题式陈述。

命题一：“用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之较无效描述和较有效的区分来取代现象—本质的区分”^[2]。

罗蒂认为，在“知道某物”和“使用某物”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跨越之处，其实“断言‘知道 X’等于断言能够用 X 做些什么或对 X 做些什么，或者使 X 与另一个事物建立某种联系”^[2]。他说，“探索的目的是效用”^[2]，“关于某个客体的诸描述中的任何一个描述都不是关于客体与它自身之关系的描述。诚然，其中某些描述比另一些描述更好。但是这个‘更好’是‘更有效的工具’的意义上的‘更好’，即这些工具比其他竞争性描述更好地达到了人类的目标”^[2]。所以，罗蒂说我们应该用“相对适宜度”来取代客观和主观的区分，也就是本质和现象的区分。

罗蒂说自己并不怀疑，“在存在关于树和星星的陈述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着树和星星”^[2]，但是他认为如果没有树和星星的关系特征，它们是什么呢？没有我们关于它们的陈述，树和星星毫无意义，争论它们的存在与否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将这种陈述看作是人类对于“适应的追求”，不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这些陈述有什么用处呢？

命题二：“用过去和未来的区分取代永久性结构和过渡性内容之间的古希腊的和康德的二元论”^[2]。这种替代也就是用“更令人满意的未来代替不令人满意的现在，因此用希望代替必然”^[2]。

这个命题是从命题一引申出来的。通过否定二元论，将二元论诉诸于行动和效果加以解决，罗蒂的理论不再求助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他说，任何行动和效果只有在未来才能显现出来，所以，罗蒂将目标和未来当作建构任何理论的唯一旨趣。这样就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叙事框架，使哲学变成一种“希望的哲学”，与此同时，秉承这种反基础、反本质的哲学观，凭借实用主义思想破解长达几千年争议的哲学就成为一种新的希望。

罗蒂希望这种新哲学“与其讨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如讨论贪婪和自私；与其讨论劳动的商品化，不如讨论入不敷出的工资和失业，与其讨论社会阶级分化，不如讨论摊到每一位学生身上的不同的教育经费和实行医疗保健的不同路径”^[2]。这种平凡化哲学的思路，使得罗蒂认为，哲学思潮只不过是可以借用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是否值得我们利用，要看它是否能够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所以，罗蒂说，许多学者现在把时间都浪费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上，浪费在我喜欢称作‘越规性’和‘颠覆性’的文化研究上，却不愿意花时间去思考什么将重振社会民主党，如何补救领先项目”^[2]等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与此相关联罗蒂建构了一个乌托邦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除了人类的自由同意以外，不存在其他的权威资源”^[2]；在这个乌托邦里，“每个人的道德同一性在很大程度上——尽管显然并非唯一地——是由其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参与感建构起来的”^[2]。罗蒂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类各种可能性的整个范围才得以展开，社会也就有了新的希望。

总之，通过对罗蒂思想的总结，我们可以对罗蒂的主张做一概括：第一，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第二，反二元论、反表象主义；第三，反客观真理观。这三点与后现代主义观点最为契合。第四，实用主义思想，即依靠行动和实践的效果评判理论和工具的有效性。

四、对现代主义社会学的影响

随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

渗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逐渐向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演变，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逐渐变得开阔。但与此同时这些思想的引入也对建基于现代主义思想框架上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对此挑战和威胁置之不理或过度吹捧都不是正确的态度，而吸收其有价值的思想，反思以往现代主义框架本身和在此框架下建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才是社会学家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杜尔凯姆早在《实用主义与社会学》一书中就提出，古典实用主义对于理性的抨击非常激烈，这种激烈的抨击会导致我们所信奉的理性主义受到质疑，会对依据这种理性主义进行理论建设和实践行动的国家和民族产生重要的颠覆性影响^[3]。现代主义社会学建立在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基础上，与实用主义的出发点相悖，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作为这种古典实用主义的继承，社会学也必须迎面回应这一思潮。

笔者认为，罗蒂新实用主义对于社会学的挑战可以归结为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两个方面。首先是最重要的在实用主义层面。因为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延伸和应用，所以说清了实用主义层面，新实用主义的影响会不言自明。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社会学强调存在着一种客观的现实，我们的知识是对这种实在的精确性把握；现代主义社会学追求一种客观真理，这种真理可以用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相反地，实用主义却认为实在与反映是“经验性的”，两者都存在于经验事实中，而经验事实无非是一种观念之间的联系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主义社会学的二元预设；另外，实用主义主张“真理即效果”，是不是真理，并不由主体反映客体的精确性得到证明，而是由产生的实质性的效果决定。尽管罗蒂从“协同观”阐述他的真理观，也就是看能否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目的，但罗蒂的真理观与古典实用主义的实质一样，仍然归属于约定论和相对主义。

从方法上来看，现代主义社会学依据的方法论划分大致可分为实证主义体系、人文主义体系和批判主义体系，每种体系所采用的方法存在着一些差别。而实用主义思潮却没有对各种方法的

偏好，而是强调各种方法只不过是工具，能达到目的的方法就是好理论、好方法，反之则否。虽然罗蒂在论证时利用了语言学、现象学、阐释学等方法，但他并没有执着于这些方法，只是把它们当作确立实用主义框架的手段而已，最终都归于实用主义的统领之下。

第二个层面是罗蒂思想中的后现代主义。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主张对现代主义的思想和社会领域进行断裂性的批判，“鼓吹新的、激进的后现代话语与实践，号召用新的范畴、新的思维和写作模式、新的价值和政治去克服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不足”^[4]。后现代主义虽然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但都肯定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反表象主义的观点。罗蒂也是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对实在论、表象论、真理论等观点进行抨击的。所以，罗蒂思想的后现代主义对于长期处于现代主义框架内的社会学构成了挑战。现代主义社会学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预设、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是传统实在论、表象论、真理论等的产物，必然遭到罗蒂哲学观的批判。

但是，罗蒂新实用主义理论的本身却蕴含着另一层深意。虽然我们从罗蒂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对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巨大挑战，但如果根据罗蒂的思想，现代主义社会学框架会被从根本上颠覆，却不符合实际。笔者认为，罗蒂思想所蕴含的理论预设并非是要推翻，而是要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争论，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非一种毫无建设性价值的理论，罗蒂只不过借此来批判长期高居霸权地位的绝对真理观，抨击一切认识都存在基础的镜像论而已。在罗蒂那里，这种工具的旨归在于促使社会学家反思以往的理论框架和方法预设，提醒我们采用一种相对平等的观点来看待其他理论，而不是霸道地反对任何不同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可以说，恰恰是这种提醒，使现今的社会学会走上更加合理的发展道路。另外，如果罗蒂的批判本身对社会学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话，那么实用主义蕴含的实践观对于社会学来说更是如此。罗蒂认为，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是一种工具，要根据其实际效果来看待它。虽然这种实用主义观点不免陷

（下转第40页）

- [5] [美]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M].王澹如,陈今池译.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99-100.
- [6] Parker R H, G C Harcourt, G Whittington. Readings in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Income [M]. second edition, Oxford, England: Philip Allan Publishers Ltd, 1986: 5-6, 9.
- [7] [美]罗斯·L.瓦茨,杰罗尔德·L.齐默尔曼.实证会计理论[M].陈少华,黄世忠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139, 17.
- [8] 王建刚,朱金一.公允价值理论研究:文献综述[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25 (3): 18-23.
- [9] 孙永军.基于资产负债表观的公允价值思考[J].会计之友,2009, 7 (上): 74-75.
- [10]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247.



(上接第 21 页)

入唯心主义的真理观和实践观,但搁置争论、将理论的效果放在未来的希望却使得我们看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彼此不同的理论、方法,只有通过将来的实际使用效果来评判。而且,对于地方性、差异性真理的强调,也让我们感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预设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潮存在的可能性,并没有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惨烈场面。

所以说,罗蒂的思想对现代主义社会学框架的确构成了挑战,但这种挑战最终是以罗蒂利用实用主义观点调和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端为结局的,而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代表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标准与后实证主义者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科学方法论中都有所反映。

〔参考文献〕

- [1]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 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 13, 30, 35, 41, 363, 365, 367, 381.
- [3] 杜尔凯姆.实用主义与社会学[M].渠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
- [4]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8.
- [5] 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6] 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M].陈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7] 涂纪亮.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8]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9] 谢立中.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理论述评[C].谢立中,阮新邦.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0] 杨寿堪,王成兵.实用主义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1] 约翰·杜威.实用主义[M].杨玉成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